

试论皖南事变中新四军的北移路线

朱 峰

1940年10月19日,国民党顽固派发出以何应钦、白崇禧署名的《皓电》,对我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极尽造谣污蔑之能事,并且无理强令在大江南北坚持抗战的我军在一个月全部撤到黄河以北地区,开始了第二次反共高潮。11月9日,我党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名义发表《佳电》,以无可辩驳的大量事实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污蔑。同时表示,为顾全团结抗战的大局,我党可以将皖南地区的新四军部队移到江北。

当时,新四军可供选择的路线有三条:

第一条路线,由驻地云岭向北,直接从铜陵、繁昌之间北渡抵江北再转皖东根据地。

第二条路线,由云岭向东经马头镇、杨柳铺、孙家埠、毕家桥、誓节渡、郎溪至竹簧桥、水西地区(苏南指挥部所在地),再经苏南敌占区寻机渡江到苏北。

第三条路线,由军部驻地云岭南下茂林、星潭、三溪、胡乐司到涇德、宁国转广德,然后沿天目山麓到苏南郎溪、溧阳再待机北渡苏北。这条路线大致上就是后来皖南新四军移动的路线。

1941年1月6日至14日,在安徽涇县,国民党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9000人除1000余人突围外,其余悉数被国民党军队围歼;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和副参谋长周子昆被叛徒杀害,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这是抗战时期我党我军最大的一次损失。长期以来,史学界将新四军受损的主要原因归罪于项英选择了一条错误的北移路线。而笔者却认为项英所选择的南下路线在当时是唯一可行的路线。理由如下:

一、新四军的北移路线是曾经国民党认可的路线

1940年4月11日,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赴上饶与第三战区长官顾祝同谈判。顾祝同提出,今后战区作战中心在苏南与浙南,新四军在皖南兵力太多,宜向苏南转移,加强敌后作战布置。顾并且以个人人格担保新四军从云岭到宁国转移路线的绝对安全。4月17日,项英致电中共中央,提出放弃皖南,军部移苏南,与陈毅支队联合。21日,陈毅、粟裕联名致电中央,建议皖南部队东移,全力发展苏南。23日,项英又致电中共中央,强调“军部留皖南争取几个月和平,亦无法解决人枪款问题,应即向苏南靠拢。”26日,中共中央明确答复:“皖南军部以速移苏南为宜。”5月4日,中央又指示项英:“同意军部后方机关及皖南主力移至苏南,惟请注意皖南力量不要太弱,并须设置轻便指挥机关,以便坚持皖南阵地并发展之。”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项英于5月28日制定了东移计划,6月派出以李志高为团长的参谋旅行团前往苏南,侦察军部东移的行军路线,并着手东移的军事部署。后来,因

顾祝同拒绝划广德、郎溪、溧阳、溧水、金坛、宜兴六县为新四军防区，军部东移的事拖下来了。

10月30日，叶挺、项英致电中共中央，再次提出军部移苏南的问题，并谈到移苏南就得放弃皖南阵地，不可能留一部分转移一部分。11月1日，中央复电项英：叶挺及一部分工作人员必须到江北指挥江北大部队；项英及皖南部队或整个移驻苏南再北渡长江，或整个留皖南准备于国民党部队进攻时向南突围，两者应择其一；如移苏南须得顾祝同许可，如顾不许可，只好留皖南。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叶挺于11月上旬亲赴上饶司令长官部洽商我军北移事宜。据钱俊瑞回忆：11月9日，叶挺到上饶，与顾祝同洽商新四军北移的路线、日期和开拔费等。10日，顾祝同对叶挺所提问题作的答复是：1.新四军开始北移时，所欠9、10、11、12月份经费当即转请补发；2.自4月份起尚未发给的子弹当转请补发；3.对在前方抗敌受伤的将士，答允予以适当的处理；4.北移路线：由茂林、宁国，经苏南渡江北上；5.移动期限：部队限1月28日前搬完，兵站留守处限2月2日以前全部结束。当时叶挺于第三、四、五点全部接受。关于经费子弹，叶挺要求先补发两个月，顾祝同也表示可以，但要新四军北移到宁国时向上官云相总司令部领取。①

皖南事变的幸存者傅秋涛、杨帆、郑德胜等都回忆说新四军的北移路线是叶挺与国民党商定的路线。傅秋涛回忆：“叶军长亲自奔走，向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提出北移路线，并要求沿途国民党军队不得阻拦。顾祝同同意我军经泾县、茂林、宁国、宣城、郎溪至苏南敌后北渡，并允于沿途保护。”②郑德胜回忆：叶挺亲自与国民党当局谈判我军北移问题，“国民党要新四军由云岭出发，翻越丕岭，取道旌德、宁国经天目山进苏南，再过江到苏北”，“转移前，项英还派人到上饶找顾祝同要求增补武器弹药。顾祝同说我以人格担保，从云岭到宁国没有一个日本兵，待到宁国后，连同以前欠的武器弹药全部补齐。”③杨帆也回忆：新四军“从茂林到三溪入旌德、宁国转广德、郎溪到溧阳渡江北上”的北移路线，是叶挺军长在上饶同国民党第三战区谈判北移问题时，“战区当局所指定和保证安全的”路线。④

傅秋涛当时是新四军一支队的司令员兼政委，是皖南事变中突围出来的为数不多的领导人之一；钱俊瑞和杨帆当时都在军部直属机关工作；郑德胜是项英的老警卫员，他们都经历了皖南事变的整个过程。他们对皖南新四军北移路线的回忆，大体是一致的，也是可信的。

根据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的少将参谋处长岳星明的回忆：1940年10月下旬，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拟定的新四军北移路线为：“先向南经旌德转向东进，经宁国南侧，广德、郎溪之间，再经金坛、句容之间，从镇江以东渡江。”⑤这条路线，基本上就是后来皖南新四军移动时所走的路线。岳星明接着回忆，为防止皖南新四军不按规定的路线行进，特别是为阻止新四军上黄山山脉打游击，第三战区还制定了一个防堵计划。经顾祝同核定，分别下达。主要内容是，抽调79师、40师、52师、108师和146师，部署在太平、休宁、屯溪周围。岳星明是顾祝同的心腹，参与戎机，曾代表顾祝同主持召开徽州军事会议，布置对皖南新四军的围歼计划。他的回忆与傅秋涛等人的回忆相符合。在皖南事变发生后三年半，陈毅在《皖南事变的真相》一文中也讲，叶挺于12月初（应是11月上旬），亲往三战区司令顾祝同处面商北移路线。经顾祝同同意，由皖南动身，经苏南过江。⑥据此，笔者认为，皖南新四军北移的路线是叶挺军长根据党中央“移苏南须得顾祝同同意”的指示，与国民党当局

商定的北移路线，说“皖南新四军向北路线是项英个人决定的”，是不正确的。

11月底，为了进一步完成新四军北移的准备工作，叶挺又去宣城周王村与国民党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谈判北移问题。上官云相却提出，北移路线，最好是从现在驻地向北，在芜湖以西荻港附近过江。叶挺提出渡江地点希望能从镇江过江开到江北，开出守备线进入沦陷区的路线，须经泾县、宣城以南，溧阳以西，向北开出守备线，进入沦陷区金坛、溧水的山区地带。上官云相当即表示：“你愿意从镇江渡江也可以。行军路线最好是从驻地往北，由马头镇开出守备线经宣城以北开往镇江。你先派人侦察，这个好商量。”不久，行军路线确定为由泾县——周王村——黄渡镇——誓节渡至竹箦桥地区进入沦陷区。但上官云相只同意非战斗人员从此线通过，至于战斗部队，仍坚持从驻地往北就近渡江。

11月底和12月初，就出现了国民党方面相互矛盾的许诺。一方是第三战区司令部允许向南走宁国再到苏南过江北上，另一方是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只准非战斗人员取道东移苏南。

12月10日，蒋介石为使新四军不直接参加对苏北国民党韩德勤部的“攻击”，以特急电令顾祝同只准皖南新四军从原地北渡，不准由镇江北渡，或由顾祝同“另予规定路线”。这个“另予规定路线”后来一直未加提出，实际是不予规定路线。1941年1月3日，蒋介石拍电报给叶挺，指定新四军的北移路线是：“（一）该军应在无为附近地区集结，尔后沿巢县、定远、怀远、涡河以东睢州之线，北渡黄河。遵照前令进入指定地区，沿途已令各军掩护。（二）所请补给，俟到达指定地点，即行核发。”^①

总之，1940年11月底以前，国民党是同意皖南新四军从云岭经宁国移往苏南的。但是到12月上旬，又自食其言，不同意新四军从镇江北渡。

二、新四军的北移路线是当时唯一可行的路线

在分析这个问题之前，需要声明的是，应该把1940年12月28日新四军军分会决定的北移路线与这之前项英拖延北移两件事严格区分开来。本节所讨论的问题是28日决定向南开的正确与否，至于拖延北移的责任由谁来承担，限于篇幅，将另文论述。

笔者认为，1940年12月28日中央军委新四军军委会决定的北移路线是唯一可行的。

（一）12月底，皖南新四军从驻地往东走苏南已经不可能。

11月底，上官云相允许皖南新四军非战斗人员往东移苏南，但始终不答应战斗部队往东走。到了12月中旬，国民党方面就完全拒绝了新四军从镇江过江的建议。况且第三战区第三十二集团军在东移的路上布下了天罗地网，往东走，无异于自取亡途。傅秋涛回忆：“1940年12月3日，我军开始陆续出发，军部所属各部门人员和行李先行，军部机关及一部分部队，也于11日集中，待命出发。詎料顾祝同突然命令我军改道，不准经苏南敌后北渡，只准从繁昌、铜陵渡江。我军为了顾全大局，即准备改道。”^②不错，12月初，皖南新四军后方机关人员曾前后分三批东移苏南，都没有发生什么大问题。有人以此为依据，说如皖南部队东移而不是南下则可避免严重的损失。这忽略了三个基本的事实：1.前三批人员属非战斗人员，国民党当局答应允许通过；2.12月初，苏北战事还不紧，经过黄桥反击战的打击，韩德勤仍可守住兴化城。而到了12月底，苏北国民党军队在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包围中岌岌可危；3.顽军的目的不在于消灭非战斗人员，而在于袭击皖南主力部队。国民党军队放新四军非战

斗人员东移苏南，很可能是对皖南新四军主力的一个诱饵。

更重要的一点是，苏南情况不允许皖南大部队立足。“我第一批出动人员至苏南后，正遇敌人扫荡，且京沪路敌封锁甚严。”⑤钱俊瑞回忆：“当前第三批人员东移后，三支队谭震林副司令员自苏南来电，说为首的几批人员已到达苏南某地。但敌人早已知道新四军要经过此间北移，故已开始扫荡。原有据点势将移动，大批人员要冲过封锁，一时完全不可能。……，这样的报告连来了几个。于是，后面的军直属队等，都不能按照原定日期向苏南进发。且叶挺军长乃电顾祝同，说明这种困难，请求稍延日期。这就是当时新四军不能按照限期离开皖南北移的真正原因。”⑥

由于顽方不答应东移，加上苏南日寇大扫荡，东移途中是国民党的嫡系108师和52师重兵把守，处处设防，皖南新四军东移是非常危险的。

（二）12月底，皖南新四军从驻地北移，在繁昌、铜陵间过江也不可能。

原来新四军大江南北的交通运输，是靠由皖南敌后区（芜湖附近）渡江经无为的路线来维持的。后来桂军开到无为地区后，经常袭击新四军的交通线。新四军参谋长兼江北指挥官张云逸夫人、孩子及曾昭铭等二十余人，并军饷七万元被桂军扣留后，这条运输线即完全断绝。虽经屡次抗议要求开放，但终归无效。因此，新四军大江南北的交通运输停顿了数月之久，后才改道苏南过江北。

12月25日，皖南新四军奉令改道经皖南铜陵、繁昌渡江北，实际上过江决不可能。原因有：1.皖南新四军背受顽军五个军的三面包围，东有冷欣军，南有张文清军和莫兴硕军，西有范子英军与陈万仞军。北面则有日寇十五师团集中于繁昌、铜陵地区。2.新四军渡江北移，敌人早已广播，所以日寇陆上十五师团加紧布置，数百汽艇往来梭巡于扬子江上。3.当顾祝同改道命令传来的时候，江北李品仙、王敬久、莫德宏等，却又专门抽调三师人马上在沿江无为一带集结，占领渡口，封锁道路，扣留交通器材。他们还公开声明要把新四军消灭于扬子江滨。同时，国民党霍守义部也积极南下配合。日军在江北运河沿线增加兵力，对新四军重要据点进行轰炸。国民党还在溧园设立“扫荡新四军总办事处”。皖南新四军司令部曾派张元培和张元寿等渡江侦察，尝试两次，均不成功，并被夺去船只。江北指挥官张云逸曾派小部队到无为地区侦察，也受桂军猛烈袭击而失踪。4.《皖南事变要报》中讲，到12月下旬，皖南沿江日寇也增设据点，构筑碉堡，并派兵舰在江中不断游弋封锁，铜陵至荻港间的封锁线甚为严密。皖南新四军队伍庞大，1万余人不可能在敌人据点附近运动，必须从距离敌人较远的路线通过，所以不能从泾县以北过渡青弋江，必须经过茂林、宁国向苏南转移。⑦

考虑到以上原因，项英于1940年12月25日报告中央：“近顾忽令我军改道。”“繁、铜由我驻地到江边，须穿插封锁线，约经五十里之河网敌区始抵江边。如遇两军（敌人）发觉后即不能渡，大军不能穿插，只能分批偷渡。如被敌发觉，极危险。特别在江中遇敌艇，毫无办法。只要一舰军舰停泊江中，便无法偷渡。如无友军在对岸堵截和友军在后夹击，假如相当时间，若断若续的分批偷渡当可，否则有被截断或遭腰击之危险”。“部队早已整装待发，两方交通因敌顽两方不能顺利北渡。”⑧

（三）既然东走、北移都不行，那么南下茂林到宁国再到苏南，就不能不变得十分重要了。

1941年1月18日，刘少奇在《关于驳斥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皖南事变借口的通报》中指

出：皖南大部队不能在驻地北渡青弋江。因为一来人数多，目标大，会引起日寇据点的注意；二来北面的青弋江面宽且水很深。加上泾县之南青弋江有转浅的徒涉点，故皖南部队必须在泾县以南渡青弋江，然后经茂林、宁国移往苏南。

皖南新四军部队弹药经费缺乏，因此，必须经过宁国一带领取子弹和经费。第三战区也曾答应过。11月中旬，顾祝同面允补发两个月的经费、子弹。当先头部队过宁国时，这笔经费没有领到，经再三交涉才补发到12月份。因新四军连续作战，伤亡一万多人，要求当局给一些抚恤金，也分毫未得。棉衣费一项数十万元，也没有补给。新四军移动经费浩大，伙食一项，每日即须开支万余元。皖南物价低，苏南物价高，所以新四军请求照例给以开拔费。直到1月初，第三战区才批准两万元。1月4日晚才由新四军驻上饶通讯处负责人吴金魁领到。他赶回军部，部队已经开动了。

将计就计以迷惑敌人，也是皖南新四军南开的一个原因。军部政治部敌工部长林植夫回忆：1月3日晚饭后，袁国平一面指示，一面说明，最后补充说：“现在他们（指顽军）说我们要进攻黄山，因此军部决定必要时派一个营故意向太平方向前进，把他们部队吸引到那方面去，我们好从这方面撤走。只要走到他们屁股后面，那么我们随便怎么走都没有危险了。”^⑩1941年5月，刘少奇在新四军高级干部会议上也承认：“据我们的估计和推测，项英向南走还是有道理的。……据说，向南走是他们的计划。向南走一下是让敌人注意，迷惑敌人的判断，然后再向东转，钻空隙间突出来。”^⑪

最重要的一点是出于对敌情的分析。李一氓参加了1940年12月28日的新四军军分会，从他于1941年3月20日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所写的报告中可以看出，当时新四军军分会研究北移方向时是这样判断的：我军行军路线是，1.三战区原来指定的到苏南的路线，新四军必须通过国民党52师和108师的防地，那时两师的兵力及苏南国民党52师冷欣部都已分别集中，在我军经过的地区已筑好工事；2.稍偏点走国民党52师及108师的背后，但仍须打两个师；3.再南走泾县、宁国以南，旌德以北地区，脱离52师及108师，但与40师有遭遇的可能，新四军估计只打40师力量有余；4.所以决定走南线。

三、新四军的北移路线是党中央同意的路线

鉴于繁昌、铜陵地区的严重敌情，党中央于1940年11月1日指示项英将皖南部队“移苏南再渡江北。”并明确指出：“移苏南须得顾祝同许可。”^⑫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叶挺军长亲赴上饶与顾祝同谈判，商定新四军由军部驻地云岭南下茂林、三溪入旌德、宁国转郎溪到苏南，然后北渡长江到苏北。笔者认为这条北移路线是党中央知道和同意的。根据如下：

一、项英在1940年12月25日就皖南新四军北移向题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近顾忽令我军改道……我们的行动如何？请考虑后即速示，以免陷于进退两难之境地。”既然向党中央报告“近顾忽令我军改道”，并向党中央请示“我们的行动应如何”，其前提就是党中央已经知道叶挺和顾祝同前已商定的新四军移动的路线。否则，报告中讲“近顾忽令我军改道”，这“改道”一词岂不是会使党中央莫明其妙吗？

二、事实证明，党中央是清楚“改道”一词的含义的。1940年12月25日，毛泽东、朱德关于向蒋介石交涉新四军北移路线致周恩来、叶剑英的电文中就有这样的指示：“请速向蒋介石交涉下列各点，并速告结果：（1）须分苏南、繁、铜两路北移。（2）须有两个月时

间，若断若续分批偷渡。（3）皖南军队不得包围，不得阻碍交通。（4）皖北军队由巢、无、和、含四县撤退。由张云逸派队接防，掩护渡江。（5）保证不受李品仙袭击。（6）弹药及开拔费从速发下。”这就是指示周恩来、叶剑英：你们向蒋介石交涉时，原来已和国民党三战区商定的经苏南北移的路线不变，但也可从繁、铜渡江，其条件是（2）（3）（4）（5）（6）。

三、1940年12月28日，项英主持召开军委新四军军分会扩大会议，决定皖南新四军绕道茂林、三溪、宁国，再迁回天目山到溧阳，然后待机北渡。会后，项英将这一行动方案电告中央。1941年1月3日，中共中央复电项英：“你们全部坚决开苏南，并立即出动，是完全正确的。”^⑤而在此以前四天（1940年12月30日），毛泽东、朱德已向叶挺、项英作过皖南新四军以“分批走苏南为好”的指示。接到党中央的复电，项英于1月4日率军南下茂林，开始按上述方案行动。显然，党中央同意了新四军军分会（12月28日）扩大会议决定的北移行动方案。

四、1941年1月1日，项英打电报给中央军委领导：“（四）铜繁江边增加两只兵舰汽艇，不断梭巡，少数人也不能偷过。（五）我们决定全部移苏南，乘其布置未定即突进，并采取作战姿态运动。”这一电报中，未谈具体移动路线，因为，“全部移苏南”，移动路线中央已经知道，无须赘述。

五、1941年1月7日，毛泽东、朱德致电叶挺、项英：“你们在茂林不宜久留。只要宣城、宁国一带情况明了后，即宜东进，乘顽军把布未就，突过包围线为有利。”^⑥1月9日，毛泽东、朱德向刘少奇查询项英情况的电文中又讲：“你说项、袁□已离开部队，我们尚未接到此项消息。他们何时离开的，现在何处，希夷、小姚（注：指饶漱石）情形如何，望即告我们。得叶、项五日报告，他们四日夜间开动，五日晨到太平、泾县间，此后即不明了。”^⑦7日指示电和9日查询电更明确地反映出，党中央知道并且同意了绕道茂林、三溪、旌德、宁国、郎溪到苏南然后渡江到苏北的计划。

六、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有中共中央军委1940年12月30日命令“皖南部队全部以战略姿态绕道茂林、三溪、旌德、宁国、郎溪到溧阳再待机北渡”的电文抄件。这个电文更加充分的说明了皖南新四军的北移路线是党中央同意的路线。说皖南新四军的北移路线是项英的个人决定，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七、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南方局以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名义发表的《北移皖南部队被围歼真象》一文中明确写道：“这次新四军江南部队北移，原由三战区长官顾祝同驳叶挺军长当面规定经由苏南渡江。”中共中央南方局之所以能迅速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与斥，原因之一就是中共中央是事先知道皖南新四军的行军路线的。

八、刘少奇于皖南事变后在《全体干部会议上的报告》（内部报告）中专门讲了“我们为什么要经过茂林、宁国向苏南转移”的四条理由，肯定了皖南新四军这条移动路线的合理性。这自然也 and 党中央知道并同意这条路线有关。

九、皖南事变发生后，新四军军部所保存的档案材料《皖南事变要报》第二部分——《决心与部署》对北移路线本身，并未提出任何批评。而是对皖南事变总结了如下教训：“（1）政治上犯了严重错误，为造成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2）战略上的错误亦为整个行动失败的主要因素。在开始未能乘顽敌准备未周时，迅速东进或北渡；乃至顽敌已有准备

向我进攻时，而我又未能迅速从顽敌间隙中突出包围圈，反而投入敌人之包围圈，此为整个战略之失着。”应该说这一总结是实事求是的。

十、即使在1941年1月《中共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中，中央也没有直接了当指出皖南新四军的北移行动路线是错误的，而是笼统地批评他们“刚刚开动走三十里，又停下来。在泾县以南之茂林地方，徘徊不进，让反共军逐渐合围。”这和《皖南事变要报》所总结的教训之二为“整个战略之失着”是一致的。

综上所述，皖南新四军的三条北移路线各有其优缺点。从表面看，第一条路线比较理想，但新四军大部队很难通过日寇的长江防线，国民党大江南北两岸的围剿部队对新四军的北渡也造成巨大的威胁。第二、三条路线优缺点对半，但第二条路线到12月底是国民党方面所不同意的。1940年12月28日中央军委新四军军分会上决定的南下茂林的北移路线是唯一可行的。从历史事实出发，肯定皖南新四军的北移路线是叶挺军长与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部商定而后来又为党中央知道和同意，并不因此减轻项英个人在皖南事变中所负的不可推卸的责任。正如《中共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中所明确指出的“此次失败，乃项、袁一贯机会主义领导的结果，非寻常偶然的战斗失败可比。”这就是项英一贯强调“一切经过统一战线”，长期不坚决执行中央“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的方针，而对国民党反动派存有严重幻想。在皖南新四军移动过程中，项英又“徘徊不进”，坐失战机，致使皖南新四军遭受重大损失。对此，项英负有重大责任。

（本文为作者硕士学位论文的一部分。论文题为《皖南事变若干问题的再认识》，约10.3万字。作者系四川师范大学政教系中国革命史专业研究生，指导教师为朱文显教授和马功成教授）

注 释：

①⑩钱俊瑞《皖南惨变记》，《中共党史资料》第11辑，中央党校出版社，第88、122页。

②④⑧⑬《皖南事变回忆录》，上海、安徽人民出版社，第65、86、85、22页。

③《新四军在安徽》，安徽人民出版社，第92页。

⑤《皖南事变资料选》，安徽人民出版社，第311页。

⑥《皖南事变回忆录》第78页。

⑦⑨⑪《皖南事变资料选》，上海人民出版社，第74、150、342页。

⑭《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十七册，国防大学编，第62页。

⑫⑮⑯⑰⑱《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70、127、128、130页。